

百年來的語言學補述

何大安

中央研究院

本文對李壬癸先生〈百年來的語言學〉中所記述的若干史事，略作解說，以為讀者之助。解說的史事，主要集中在1949年以前。解說的內容，大致包括中國現代語言學興起的背景、歷史分期、研究機構、領導人物等等。文中曾對引導中國語言學發展的主客觀因素進行檢討，並提出了個人的感想。

關鍵詞：語言學、中國現代語言學

1. 趨向

首先，我們注意到李老師文中的〈大事記〉是從1896年開始記錄的。但是在這個年代之後不久，有兩部在當時深受注目的著作，卻沒有被選列在〈大事記〉之中。它們是1898年出版的馬建忠（1845-1900）的《文通》（即《馬氏文通》），和1906-08年間出版的章炳麟（1869-1936）的《新方言》。這兩部著作之所以引起當時人的注意，不但是因為在中國語言研究的領域，它們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成系統學說，更是因為兩位作者都是懷著救亡圖存的宏願，以喚起國民對自己語言的新認識為職志，來撰寫的。¹這兩部

¹ 馬建忠在《文通·例言》中說：「此書在泰西，名為葛郎瑪。」又在《後序》中自述寫作緣起說：「余觀泰西童子入學，循序而進。未及志學之年，而觀書為文，無不明習。而後視其性之所近，肆力於數度、格致、法律、性理諸學而專精焉。故其國無不學之人，而人各學有用之學。...以西文有一定之規矩，學者可循序漸進而知所止境。華文經籍雖亦有規矩隱寓其中，特無有為之比擬而揭示之。遂使結繩而後，積四千餘載之智慧材力，無不一一消磨於所以載道所以明理之文，而道無由載，理不暇明。以與夫達道明理之西人相角逐焉，其賢愚優劣，有不待言矣。」又說：「斯書也，因西文已有之規矩。」西文之規矩，即《例言》中的「葛郎瑪」。至於章炳麟的《新方言》，則是模仿揚雄《方言》，收錄方言俗語八百餘條，以考證詞源及本字。《序》中說明考證之法，是「察其聲音條貫，上稽《爾雅》、《方言》、《說文》諸書。」又說：「世人學歐羅巴語，多尋其語根，溯知希臘、羅甸。今于國語，顧不欲推見本始。此尚不足齒于冠帶之倫，何有于問學乎？...讀吾書者，雖身在隴畝與夫市井販夫，當知今之殊言不違姬漢。」「今之殊言不違姬漢」一語，可謂全書要旨。劉申叔在《新方言》的《後序》中說：「昔歐洲希意諸國受制非種，故老遺民保持舊語，而思古之念沛然以生，光復之勳蘊蓄於此。今諸華夷禍與希意同，欲革夷言而從夏聲，又必以此書為嚆矢。此則太炎之志也。」以「革夷從夏」來闡釋「不違姬漢」，可謂深知作者。

著作，一部重點在語法——是中國人自有學術以來第一部自己寫的語法書；一部重點在方言——是兩千年來唯一可以上繼揚雄《方言》的當代方言詞彙總集。這兩部書在當時既有拔地而起的聲勢，原本應該取得為後世立法的地位，可是卻不幸被李老師摒除在〈大事紀〉之外。作者和當時的讀者如果有知，一定會感到意外。

不論《文通》和《新方言》在當時多麼引人注意，一百多年後的今天，已經沒有人會在具體的語法研究或方言研究上取法這兩部書了。這兩部書除了可以作為歷史文獻之外，還有用處的是其中的材料，而不是處理後的結果。這說明馬建忠和章炳麟雖然開啓了對自己語言新認識的發端，但是後來大家所走的道路，卻不是他們所建議的那樣。他們雖有首倡之功，卻並無垂範之效。真正的領航者，還要再等一兩個世代之後才出現。那麼，這兩部書最終被淘汰的這件事，或許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

一般認為，《文通》是以拉丁語法的框架來解析漢語，而《新方言》則是以《說文》、《爾雅》的框架來解析方言。它們都是先存了一個主張，再根據這個主張填進材料，進行演繹。差別僅在於一個先存的，是傳統西方語法的主張；另一個先存的，則是傳統中國訓詁的主張。他們當然也有蒐集和分析材料的過程，但是先存的框架卻已經限定了結論。這與我們熟悉的語言研究應該立足客觀，通過歸納，再經實證，最終才得出通則的方法，完全相反。傳統是應該受到尊敬的，但是傳統不能錯置。語言研究到二十世紀前後，和其他的學科一樣，已經發展出它的現代性。現代性的知識，應建立在歸納法以及與之相關的精確觀察、客觀分析和邏輯推理的基礎之上。歷史證明，二十世紀以來的語言學是一種現代性的語言學，而《文通》和《新方言》不是。因為不是，所以被淘汰了。

不過，淘汰的原因，與其歸諸個人，我以為，不如歸諸趨向。²今天各位所熟悉的語言學，是現代學術的一支，是把語言當作一種現象，對之進行科學的研究，以獲得一種客觀知識的專業工作。這種客觀知識，是與研究者的安身立命無關的。但是在馬建忠和章炳麟所處的時代，語言是識字之本，識字是讀書之本，讀書而後有知識；而這種知識，是一個人內聖外王、知命知天的終極價值之所由生的根源。所以他們從語言入手而建構

² 後人對《文通》和《新方言》的批評，負面居多。尤其一些過激的言詞，將彼此的差異化約成極端的對立，減損了原可相互借鏡的有益成分，令人遺憾。不過在新舊交替之際，這種現象，或恐難免。本文擬用「趨向」或「學術興趣」來概括其特色。例如我們可以說十九世紀比較語言學的學術興趣是「法則」（law），結構主義是「辨義性」（distinctiveness），杭士基是「衍生的」（generative），而中國傳統的音韻文字訓詁之學則是「明經」。一種學術懷抱甚麼信念或關懷，採用什麼方法、甚麼態度，得出甚麼結果，會因其學術興趣而有所不同。

的，是一種主觀的知識。馬建忠希望他的書能節省讀書人揣摩作文的辛勞，³以便及早致力於福國利民的學問；章炳麟希望藉由語詞與經典的聯繫，提高方言的地位，建立全國的共同語，以加速推翻滿清的革命事業；這裡都可以讓人看到語言研究從屬於主觀願望的痕跡。這種知識興趣，和一個世代之後的社會大不相同。興趣不同，趨向自異。因此，這兩部書的被淘汰，乃是時勢之所趨。個人的才具和憑藉，或許並不重要。⁴

2. 分期

其次，我們看到，〈大事記〉所記的這一百多年，是有許多起伏的。這些起伏，與國家民族的整體命運，息息相關。大致看來，這一百多年的發展，可以分成萌芽、奠基、沉寂、發揚四個時期。

從 1896 年〈大事紀〉的開端，到 1928 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前的三十年間，表面上似乎無可稱述，事實上卻極可注意。這是從戊戌變法到國民政府統一南北之間的三十年；也是對鴉片戰爭以來所謂「數千年未有之變局」的反應，進入到全民覺醒和社會行動的三十年。在政治上，經歷了帝制、變法、立憲、革命、共和、復辟、軍閥內戰的種種混亂；在思想上，充滿了中學與西學、東方與西方、科學與玄學的對立，以及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各種激辯；而文化上，作新民、反孔、反封建、反禮教，提倡新文學、推廣白話文、統一國語、創制羅馬字等等話題，無一不是輿論的焦點。至於現代學術，也已經在蔡元培先生兼容並蓄下的北大校園之中，開始萌芽。錢玄同（1887-1939）、楊樹達（1885-1956）、胡以魯（1888-1917）、黎錦熙（1890-1978）、劉復（1891-1934）、林語堂（1895-1976），是當時北方校園中最活躍的語言學家。他們培養

³ 馬建忠的時代，科舉制度還沒有廢除。絕大多數的讀書人都要學習八股文以便應考，其中不少人久困場屋，白頭仍為諸生。大半生的光陰，都用在揣摩作文上。

⁴ 比方說，1898 年前後的西方世界，仍然是比較語言學一枝獨秀的時代；北美的描寫語言學剛剛起步，而結構語言學則根本還沒有出世。當時「泰西葛郎瑪」之準繩，是以《普遍唯理语法》（*grammaire générale et raisonnée*, 1660）為規範的拉丁語語法。馬建忠既然立意仿效，則除此之外，可謂再無憑藉；即使要作取捨，也少有成例可援。他是不是有機會接觸到西方漢學家的研究成果，如甲勃連茲（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1840-1893）的《漢語經緯》（*Chinesische Grammatik*, 1881），很難確定。又如章炳麟所處的時代，究竟有多少中國人知道印歐比較語言學，也不無可疑。畢竟要到《新方言》發表的十五年之後，中國人中第一個學過印歐比較語言學的博士林語堂才學成回國。在這之前，要表現方言詞彙的語源關係，採用揚雄《方言》的體例，無疑仍是唯一的、最可行的方式；而對熟悉古書的讀者來說，也是最便於閱讀的方式。《新方言》篇末有〈音表〉一章，對古音二十三部、二十一紐的可能音變，作了整體說明。比起前人的模糊表述，顯然有了規則化的意識和努力。這些寫作背景，是我們在進行批評的時候不應該忽略的。

了許多重要的人才，像趙蔭堂（1890-1970）、羅常培（1898-1958）、白滌洲（1900-1934）、魏建功（1901-1980）、張世祿（1902-1991）等等，他們的著作，今天仍然不時為人們所引用。他們的名字，不應該被遺忘。

特別是 1923 年。這一年《國學季刊》創刊，標誌了中華民國有了自己的現代性學術期刊。⁵尤其有意義的，是這一年的《國學季刊》刊登了三篇足以啟發後學的文章。它們是胡適翻譯的鋼和泰《音譯梵書與中國古音》、汪榮寶的《歌戈魚虞模古讀考》和徐炳昶翻譯的高本漢〈對於「死」、「時」、「主」、「書」諸字母內韻母之研究〉。這三篇文章讓我們：（一）認識到了比較研究，（二）接觸到了古音構擬，並且（三）感受到了引介高本漢學說的刻不容緩。同樣有意義的，是陳寅恪也在這一年的《學衡》雜誌上發表了著名的《與妹書》，讓國人知道了我們還有「藏語」這一門無比重要的遠親，讓學術界對「漢藏比較語言學」開始有了憧憬和期待。這一年，中國人中的第一位語言學博士林語堂，才剛剛學成歸國；中國人編寫的第一本語言學概論，胡以魯的《國語學草創》，才剛剛出版；⁶而「漢語語言學之父」趙元任的歐洲壯遊，和「非漢語語言學之父」李方桂的出國留學，都還要再等一年才踏上征途。

然而，我們也必須承認，儘管出現了學有專長的語言學家，出現了特別的 1923 年，但是現代意義的語言學卻並沒有真正的建立起來。在一個新舊激盪、眾聲喧嘩的年代，這些專家們，不能不把更大的心力放在思想和文化的改造上。他們固然不乏個人語言學研究上的貢獻，但更足以表彰他們集體成就的，是新文化的推動，是國民思想的改造，而不是語言學的建立。這是第一個時期，一個高揚激盪、語言學開始萌芽的時期。

從 1928 到 1949 的二十多年，是第二個時期，一個語言學新學術、新群體建立起來的時期。成就這個新時期的關鍵，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出現；而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現的關鍵，則是國民政府的統一南北。關於史語所的角色和地位，下文再作討論，現在先說明這個時期的學術成就。這個時期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建立了新學術的典範，奠定了中國語言學發展的基礎。以下列出幾個領域的代表著作，這些著作的經典地位，

⁵ 「整理國故」和「古史辨」運動正是始於這一年；科學與玄學的大論戰，也發生在這一年。這一年是「建立科學的中國學」由提倡轉入實踐的一年，思想界的灘頭堡已經清理出來，只等各方面的人才到位。它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的重要性，不亞於中央研究院成立的 1928 年。又，在《國學季刊》之前，雖然已經有了不少具學術性的期刊，如《國粹學報》（1905-11）、《科學》（1915-51）、《青年》（《新青年》，1915-22）、《學衡》（1922-33）等等，但是多半偏於介紹和議論，研究性的論文比較少。專門發表研究成果而又態度嚴謹的學術期刊，當以《國學季刊》為始。《國學季刊》自 1923 年創刊至 1951 年結束，其間曾中斷十三年，總共出了七卷。

⁶ 這本書當完成於 1917 年胡以魯逝世之前，1923 年才由商務印書館正式出版。

經得起學術史家的檢驗：

- 方 言： 趙元任《現代吳語的研究》（1928）
- 非漢語： 李方桂〈藏語前綴對語根聲母的影響〉（1933）、〈漢藏系語言研究法〉（1939）、〈古台語帶前喉塞音聲母的假設〉（1944）
- 音 韻： 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1915-26，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合譯，1940）
- 語 法： 趙元任《國語入門》（*Mandarin Primer*，1948）⁷

這個時期雖然在政治上仍然極不安定（如中原大戰、剿共、九一八事變、對日抗戰、國共內戰），但是一個國家級的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已經建立起來了，可以有效的調動資源來推展學術工作。趙元任、李方桂是這門新學術的領導人，他們不但成功的立下了基礎，同時還訓練了一批年輕的追隨者，壯大了這個新學術群體的陣容。

中國語言學發展到了 1949 年，忽然轉入沉寂。發生轉變的原因和過程，無需詳述。在台灣，這段沉寂，一直持續到 1970 年前後。在大陸，則更延長到 1980 年代的後期。這是一個「天地閉、賢人隱」的時期，我們沒有什麼可以多加評述的。學術的薪火，只能在「花果飄零」的孤寂之中，不絕若線地默默延續和等待。這是第三個時期，黯淡的時期。

1970 年前後，湯廷池、董昭輝、梅廣、黃宣範、丁邦新、李壬癸、鄭恆雄、龔煌城等好些位先生——也是我們共同的老師們——陸續學成歸國，開始了第四個時期。他們不但穩健地接續上前輩的步伐，而且更有了新的擴充、新的內容，訓練了更多的年輕學生，使台灣的語言學由復甦而發揚。中國大陸的步調雖然略顯遲緩，但是在「改革開放」（1978）之後，也同樣獲得了新生的機會。這個時期的外在環境，相對於前三期而言，比較安定，使得學術的發展，獲得了最可貴的保障。在民國一百年的今天，我們很高興的看到，兩岸的語言學家可以更有自信地進行研究，和發表成果。同時也使我們深信，這個時期的成績，一定會比從前更為豐碩。把〈大事記〉放到這四個時期的框架中去看，我們當能體會這段發展之路的曲折與成果的得來不易。

⁷ 《國語入門》後來增訂成爲《中國話的文法》（1968）。根據何九盈（2008：88）的考察，從 1898《馬氏文通》出版之後到 1948 的五十年間，一共出現了約九十部語法書。但是這些語法著作，「基本上都以傳統語法體系爲基礎。...直到趙元任的《國語入門》，才真正運用結構主義分析法來研究漢語。」眾所周知，1948 年以後的漢語語法學，大體都以趙先生的結構主義語法爲出發點。

3. 機構

現在，我要回頭談一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李老師在論文中提到史語所三代語言學家的傳承不絕，令人嚮往。我認爲，這不只是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它的背後，有著更深的涵義。

各位知道，中國第一所官方創辦的綜合大學，是北京大學。北京大學的前身，是京師大學堂。在 1905 年廢除科舉之後，京師大學堂成爲無試可應的舉子轉謀出身的中途之家，學風敗壞；談不上教育，更談不上研究。民國成立之後，雖然名義上改爲北京大學，但是敗壞之風依舊。⁸特別是在體制上，既不像昔日私人講學的書院，也不像當時分科治學的歐美大學。民國元年，蔡元培出任教育總長，他便主張大學不是坐等「學優則仕」的養望之所，而是要「研究高深學問」。民國六年（1917），當他有機會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時，便以柏林大學爲榜樣實踐他的主張；更進而在 1922 年率先成立了「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1922-31）。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在 1917 年之前，北京大學還不是各位所熟悉的現代大學；在 1922 年之前，北京大學和其他國人自辦的大學，也還沒有各位所熟悉的研究所。

重視研究，並且設立研究所之後，才有了建立自己學術的可能。於是繼北京大學之後，相繼成立了「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1925-29）、「廈門大學研究所國學門」（1926-27）和「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1928-30）。這些研究院、所，都有「方言」或「語言」調查或研究的分組或項目。但是，從結果上來看，它們最終又都沒有完成語言學這門學術的建立。它們的出現，也還只能稱爲過渡。那麼，這又是什麼緣故呢？

首先，各位一定注意到，這些研究院所持續的時間都不長，最短的不到一年（廈門大學研究所國學門）⁹，長的也不出十年（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不長的原因，或是財力不繼（廈門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或是人事更動（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或是體制改變（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清華大學研究院）。無論如何，它們的建置都不穩定，而且爲時短暫，作用有限。

1928 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全國復歸統一，一個國家級的專業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建立了。這個機構的領導人，恰好就選擇了從民國初年以來就一直致力於教育

⁸ 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的演說詞中特別提到：「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敗，以求學於此者，皆有做官發財思想，故畢業預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蓋以法科爲干祿之終南捷徑也。」這時已是民國六年（1917）。

⁹ 廈門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雖然跨了兩個年度，實際只存在四個月。

和學術改革的蔡元培。蔡元培所領導的這個「中央研究院」，是一個中國從來沒有過的組織。「研究院」是一個新的社會部門，「研究知識」是一種新的事業，而「研究員」則是一種新的行業。於是，在一個對的時機，由一個對的人領導，「學術研究」從此成了一種可以號召國人的新志業。它的任務是創造知識、生產知識。它的研究人員是專職的、長期的，研究工作是有計畫的、有組織的，它的經費和可調動的資源，是由中央政府供給的，是最可依賴的；同時，這樣的國家級的同類型機構，除此之外也不會更有第二個。凡此種種，都是前所未有的機遇。有了這樣的機構，新的學術的建立，就有了具體可行的條件。在這個條件之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適時成立，也才因此真正開始了中國語言學的建設工作。

4. 人才

這裡還應該從人才的角度作一些觀察。現代中國語言學的建立，主要依賴的，是向歐美取經的留學生。¹⁰1949 年之前出國留學，而與中國現代語言學的推動、建設和傳承有關係的學者，至少有十幾位，他們的留學或遊學年分依次排列如下：

1909-1925	陳寅恪 (1890-1969)
1914-1925	趙元任 (1892-1982)
1915-1920	陸志韋 (1894-1970)
1919-1923	林語堂 (1895-1976)
1919-1926	傅斯年 (1896-1950)
1920-1925	劉復 (1891-1934)
1924-1929	李方桂 (1902-1987)
1927-1931	王力 (1900-1986)
1928-1931	周辨明 (1891-1984)
1928-1933	岑祺祥 (1903-1989)
1933-1936	王靜如 (1903-1990)

¹⁰ 在清末民初引進現代學術的過程中，日本的影響力非常之大。以史學而論，甚至到了 1929 年，陳寅恪還有「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的感歎（〈北大學院己巳級史學系畢業生贈言〉）。從下文第六節對上田萬年和小川尚義的介紹來看，十九、二十世紀之交，日本的比較語言學絕對有世界一流的水準。可是似乎不為中國留學生所看重。中國人之中，除了早逝的胡以魯之外，幾乎沒有到日本學語言學的。與其他學科相較，顯得非常特殊。

1935-1946	季羨林 (1911-2009)
1936-1938	呂叔湘 (1904-1998)
1936-1940	高名凱 (1911-1965)
1937-1940	袁家驊 (1903-1980)
1944-1948	丁聲樹 (1909-1989)
1947-1955	張 琨 (1917-)
1948-1950	傅懋勳 (1911-1988)

這些學者可以分成兩組，一組是 1930 年之前就已經學成歸國的，其中最晚的是李方桂；另一組是 1930 年稍前、和之後才出國的，其中最早的是王力。他們恰好代表了「第二（奠基）期」的前後兩代：李方桂之前的一代是「老師」，王力之後的是「學生」。老師的這一代，除了陸志韋，全都進了中央研究院。¹¹

第二期的老師這一代，有一位重要的大師級人物不是留學生，他是錢玄同的學生羅常培（1898-1958）。除他之外，老師們都是留學生，而且都是留學歐美的留學生。學生這一代，或者因為已經有了老師們的指導，或者因為戰亂之中機會難尋，並沒有都留學。沒有留學的，如楊時逢（1903-1985?）、吳宗濟（1909-2010）、嚴學窘（1910-1991）、董同龢（1911-1963）、馬學良（1913-1999）、周祖謨（1914-1995）、管燮初（1914-2001）、周法高（1915-1994）、俞敏（1916-1995）、喻世長（1916-1999）、朱德熙（1920-1992）、李榮（1920-2002）、林燾（1921-）等人，固然傳承了留學歐美的老師們的藝業；而凡留學的，也都仍然留學歐美。因此我們可以說，現代中國語言學的建立，取法的是歐美的語言學。¹²

5. 課題

那麼，這些留學生學到了些甚麼呢？二十世紀的前三十年，歐美的語言學有三個方

¹¹ 陸志韋的情況頗為特別。他留學時所學為心理學，回國後任教東南高等師範（南京大學的前身）和燕京大學，所授都是心理學方面的課程。直到 1937 年抗戰軍興無法進行心理學研究時，才開始從比他小十歲的王靜如學漢語歷史音韻，而卓然有成。所以他是老師的年歲，學生的排行。

¹² 黃侃（1886-1935）和錢玄同（1887-1939）雖曾留學日本，但他們在日本時，卻是從章炳麟受語言文字之學，在這方面，等於非留學生。楊樹達（1885-1956）亦留學日本，在日本曾學習「歐洲語言及諸雜學」（《中國現代語言學家傳略》第四卷，第 1601 頁。），是否接觸到語言學，並不可知。胡以魯（1888-1917）則是留日學生之中，唯一入帝國大學博言科得有學士學位的一位；但他不幸早逝。所以，至少在 1949 年以前，中國學生學習語言學的，絕大多數都留學於歐美。第四期的八位先生，也全部留學歐美。

面最爲興盛。第一個是比較語言學。繼十九世紀末的新語法學派之後，語言的比較研究不但流風不輟，而且從印歐語擴展到非印歐語，研究的範圍更見廣大。第二個是美洲的描寫語言學。由於印地安原住民沒有文字可資利用，對這些新世界語言的研究，就必須發展出一套能準確紀錄和分析的操作方法。這套操作方法對日後「結構語言學」的發揚，大有貢獻。第三個是實驗語音學。十九世紀下半葉，語音學與物理學結合的實驗語音學的研究開始出現。語音實驗室的建立，以及利用儀器紀錄、分析各種語言的語音，成爲極有吸引力的課題。將研究成果提供給「國際音標學會」以制定國際音標，就像是將發現的新物種提供給生物學會列入目錄一樣，是一種天職，也是一種殊榮。

1916年，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教程》正式出版。這本二十世紀影響最大的語言學著作並沒有在語言學界造成立即的轟動。1930到50年代的二十年間，才是結構語言學的全盛時期。《普通語言學教程》是一本觀念革命的書，要經過布拉格學派（1926-1939）、哥本哈根學派（1931-1965）和美國描寫語言學家們的共同努力，才能將原創性的觀念落實爲可操作的工作程序。所以第二期中老師一輩留歐的人，或是根本與索緒爾無緣，或是僅僅擦身而過，多半不會受到影響。趙元任、李方桂兩位，則與美國描寫語言學淵源甚深。趙先生在普通語言學方面的著作，如〈音位標音法的多能性〉（1934）、《語言與符號系統》（1968）等，都成了結構語言學的名作。¹³

第二期中的學生一輩，比老師們普遍多了結構語言學的訓練。這種訓練，使他們在語法分析、方言和語言調查，以及古音構擬的技巧三方面，表現得更爲精緻和深入。李老師所提到的董同龢的《四個閩南方言》（1960）和《鄒語研究》（1964），就是絕好的例子。¹⁴

第四期留學生出國時，已經在「杭士基革命」（1957）之後了，所以除了個別的專長之外，他們又都有「變形」（transformation）或「衍生」（generative）的觀念，在解析和詮釋語言現象時，理論的深密和發明的透徹更勝前人。關於這一點，各位當年在聽老師們講課的時候，一定都有過親切的體會。

受哪些訓練是一回事；研究哪些課題，則是另外一回事。基本上，過去近百年間，中國語言學家所研究的，並不出馬建忠和章炳麟的課題之外，也就是對自己語言的新認識，但是方法不同了，目的也不同了；範圍、觀點和取材自然也增大增多了。默察最近

¹³ 《語言與符號系統》的前身是《語言問題》（1959）。

¹⁴ 董同龢於1954-55擔任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人兩年，1959擔任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客座教授一年。他受結構語言學的直接影響，當在這一段期間。

語言學同道們的致力所在，我們發現有一種新的趨勢，隱隱然超過了已往一家、一鄉、一國的關切。這種新趨勢，源於兩種動力。一是語言學本身的趨向，一是全球化意識的興起。

十九世紀歐洲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學術興趣，在於求出語言演變的法則，建立語系的歷史；是封閉於時間之內的。二十世紀上半葉結構語言學興起之後，語言的符號學屬性獲得彰顯，其學術興趣轉而為空間的和開放的；因此相關的人文社會科學，如人類學、文學、歷史學、社會學，甚至政治學，都紛紛起了「語言學的轉向」。¹⁵到了「杭士基革命」之後，語言學的研究興趣不再侷限於個別的歷史或社會，而是拉高到全人類的層次，要探索人腦中的黑盒子，也就是人類的語言本能（*language competence*）和普遍語法（*universal grammar*），這就與生物學、腦神經科學、數理科學、資訊科學等等自然科學有了「跨科學」的各種合作和新闢領域。這是第一，來自內部的動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尤其是冷戰結束之後，思想、文化和意識型態的壁壘逐漸消解。再加上經濟活動的擴張、交通與通訊的便捷，以及環境與生態問題的成為人心之所共切，一個聲氣相通、休戚與共的地球村正在快速形成。這種不斷擴大的全球一體的意識，使身在其中的語言學家不能不對人類語言的共同命運有所關注。如何一方面促進全球性或區域性對話的便利，創造更豐富多彩的文明，一方面又最大程度地保存語言的多樣性，對瀕危或弱勢語言進行復育或保育，自然就成為推動語言學下一階段前進的動力。這是第二，來自外部的動力。

6. 啟示

1894年，甲午戰爭。1895年，割讓台灣。這是近代史上的國恥。〈大事記〉記錄的第一件事，1896年「日本語言學家小川尚義到台灣來」，固然只是語言學史的如實記錄，不需過度反應；但是這樣的第一筆記錄，仍然不能不讓我們一開卷，就陷入慚愧之中，無法釋懷。

小川來台的任務，是推行日語。這和五十年之後魏建功、齊鐵恨、俞敏等人來台推行國語，沒有兩樣。小川用平假名來編纂台灣漢語和原住民語言的字典，和西方傳教士用拉丁字母來編纂中國各地的方言字典，也沒有兩樣。可是1907年，當他為了替《日台大辭典》撰寫緒言而進行漢語方言的調查和比較，並進行中古聲母的構擬時，他所做的，

¹⁵ 「語言學的轉向」（*linguistic turn*），最早發生在哲學領域，主要是指維根斯坦的影響。人文社會科學的轉向，則是指索緒爾的影響。二者內涵並不相同。

是比高本漢和趙元任要早得多的相類似的工作。雖然還看不出有更宏大的企圖，但是出手不凡，已經超越了語言教師和傳教士的格局，令人刮目相看。等到 1935 年《原語による台灣高砂族傳說集》出版的時候，他所到達的高度，使西方世界同時出版的 Otto Dempwolff 的《南島語語詞比較音韻》(1934-38) 頓居下風，這就不能不令人擊節嘆服了。小川來台灣時，剛從東京帝大博言科畢業；一生從來不曾留學過。他的本事，為甚麼同時代的中國人就沒有呢？

日本有意識地翻譯和引進西方科學，是從十八世紀末的「蘭學」開始的。早於中國，將近百年。經過明治初年的大規模派遣遊學官員和留學生，到了十九世紀的八十年代，日本現代學術的規模已經大體建構完成；比中國早了至少四十年。¹⁶小川尚義的老師上田萬年(1867-1937)，就是在這種背景之下，於 1890 到 1894 年間留學萊比錫大學，親身受業於新語法學派的掌門人 Karl Brugmann (1849 - 1919)。他回日本後，就任東京帝國大學博言科的講座，講授比較語言學和語音學。我們相信，這兩門課，一定對小川尚義的語言學事業，起了決定性的指導作用。上田萬年的學成歸國，比同入萊比錫大學、同樣學比較語言學的林語堂早了三十年。三十年，就像李老師所說的，在學術的傳承上，就是兩個世代了。

不過，我們起步雖晚，種種條件雖不理想，但是許多成就也足可令我們自豪。這裡舉兩個第四期的例子，作為說明。

1940 年代末期以來，研究東南亞地區的語言親屬關係，成為當代比較語言學的熱門課題，但是各家研究結果卻大有出入。研究結果是否可信，除了語料的掌握充分與否之外，理論方法之是否堅實合理，尤其是其中的關鍵。在這些討論之中，李壬癸(2004a)先生敏銳的指出，作為基礎語料的「同源詞」，如果不同時考慮它在本語言中的構詞功能和系統表現，就草率的依據表面詞形進行比較並作出結論，這是非常危險的。換句話說，要比較的，不只是個別的「同源詞」，更必須是同源的、成組的「系統詞」。這是理論上的一大突破。因為只有「系統詞」，例如人稱代詞系統，而不是個別的人稱詞，才能體現語言內部的自成系統的特點。個別的「同源詞」容易因語言接觸而移借，體現系統性特點的「系統詞」則不容易。對於相鄰已經數千年的東南亞地區語言而言，同源的「系統詞」的證據力無疑大過個別的「同源詞」。李老師的洞見，不但澄清了許多疑點，更重要的，是推進了比較理論的深度。這是第一個例子。

各位細讀李老師的論文，當能發現 1970 年代以後，也就是第四期之後，語言學的視

¹⁶ 其具體表徵就是 1877 年根據《新學制令》所設立的東京帝國大學。

野忽然大為開闊，許多跨學科和跨科學的研究紛紛出現，蔚為大觀。這是我要舉的第二個例子。1950年，羅常培出版了《語言與文化》，成為中國語言學界第一本跨學科的著作。但是隨著整個學術的轉趨沉寂，跨學科的研究後繼無力，乏人問津。不過，到了第四期就不一樣了。許多研究，不但跨學科，更是「跨科學」的。上文曾經提到，「跨科學」，是「杭土基革命」之後的新趨向。而在這波新趨向之中，出身台灣的語言學家們，以其優異的素質和成就，得到了國際學界的高度矚目。他們在各種國際學會和會議中的活躍表現，以及《語言暨語言學》為國際引文索引資料庫所收錄的事實，都可以作為明證。

李老師的〈大事紀〉結束於2008年。這一年，李老師記道：「《語言暨語言學》成為SSCI, A&HCI, LLBA, MLA收錄的國際期刊。」為國際引文索引資料庫所收錄，只是目錄學上的一件小事。不過，它對我們有意義。它表示我們的研究成果是與世界同步的。我們不再落後，我們已經迎頭趕上。

1896年，我們慚愧。2008年，我們趕上。〈大事紀〉富含深意的記錄，給了我們無窮的啟示。

引用文獻

中國語言學會《中國現代語言學家傳略》編寫組.2004.《中國現代語言學家傳略》。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何九盈.2008.《中國現代語言學史》。北京：商務印書館。

陶英惠.2008《民國教育學術史論集》。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

趙新娜、黃培雲.1998《趙元任年譜》。北京：商務印書館。

何大安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dahanho@gmail.com

Addenda to the Centennial History of Linguistics in R.O.C.

Dah-An Ho
Academia Sinica

This paper provides a few thoughts concerning some historical events touched on in Professor Li's "Centennial History of Linguistics in R.O.C.". Most of the events took place before 1949, including the background of the dawning of modern Chinese linguistics, historical periodization, research institutes, leading scholars, and so on. It also examines the factors that have influenced and may continue to influence the developments of modern Chinese linguistics. It also presents the author's personal opinions.

Keywords: linguistics, modern Chinese linguistics

